

齐鲁文化英才专项资金支持项目

纪录片创作的 个维度

Seven Dimensions in Creating Documentaries

范维坚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齐鲁文化英才专项资金支持项目

纪录片创作的七个维度

范维坚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纪录片创作的七个维度/范维坚著.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607-5505-2

I. ①纪… II. ①范… III. ①纪录片—艺术创作
IV. ①J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9481 号

责任策划:姜 明
责任编辑:姜 明
美术编辑:张 荔
封面设计:邹阳阳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7.75 印张 32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序

我曾经说,选择了电视纪录片,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其实,选择了电视纪录片,也同时选择了一个特定的朋友圈。普天之下的纪录片人皆为同道,情怀相近,意气相投,凭借业务研讨的纽带,以“片”会友,互相切磋砥砺,很容易成为可以信赖的朋友。

知道和认识维坚是在2005年,在那一年的四川国际电视节纪录片“金熊猫奖”评选上,他以《乡胞祭》首次参评,就获得了最佳短纪录片“金熊猫奖”。他的作品直逼现实,选材独到,浑实厚重,大开大阖,给我和众评委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加上他又来自我的家乡齐鲁大地,浑身上下透着山东人的厚实、文气和执着,所以我就不免对这位年轻纪录片“新人”多说了几句肯定和鼓励的话,期望他能继续拍出好作品。让人惊喜的是,在随后几届四川国际电视节纪录片“金熊猫奖”评选中,维坚竟都有作品入围参评,并且,2005年、2007年、2009年、2011年连续四届捧得“金熊猫奖”;这期间,他在中国新闻奖等多项全国奖评选中收获颇丰,作为电视界的一个老兵和他的同乡,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据我所知,维坚当时是山东电视台新闻中心的记者,本职工作是采访新闻而非拍纪录片,他的纪录片作品都是新闻采访工作的“衍生品”——日常新闻采访中处处有心时时留意,发现适合做成纪录片的好题材就盯紧不放,进行深度开发和长线跟踪。所以可以想见,维坚在做日常新闻的同时再做纪录片,工作强度是很大的,很是辛苦。但是同时这一方式也赋予维坚的纪录片以题材上的优势,他的纪录片新闻性都比较强,紧贴社会跃动的脉搏,很多是当下的重大事件和热点问题,选题尖锐锋利,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

三年多前,听说维坚因工作变动离开纪录片创作一线,我感到很是惋惜,总觉得他的纪录片创作正处于上升期,应该有更多有力量的作品出来,我也在揣测一个纪录片人暂别创作岗位时的心情,应该是复杂和不舍的吧。

但是前不久,当维坚把这部厚厚的书稿摆放到我面前时,我就知道,他的心不曾须臾远离过纪录片,他是真正的纪录片人,对纪录片的情怀永远是浓得化不开——我心里满是欣慰和快意!

一项事业的发展,常常离不开两个基本因素:一是鲜活的实践,二是理性的思考。纪录片的发展离不开创作者和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电视发展的专家学者对纪录片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判断,为纪录片创作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与专家学者积极主动的学术活动相比,来自纪录片创作主体——纪录片人对自身创作的沉淀、自省、归纳和提升还偏少,作出的理性思考还略显不足。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凡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学术抽象活动由置身事外的人完成,拉开距离看得更清楚些;但是也不要忘了“都云作者痴,谁解此中味?”创作是创作者的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发生化学反应的特殊过程,其中的奇幻瑰丽恐怕非创作者本人不可得也。维坚在本书“结构驱动”一章中就表达了这种观点:“创作者心知肚明的东西分析者未必了然于胸,旁观式分析研判与创作主体实际操作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由创作者本人谈创作,拿起放大镜做内窥式自我剖析和总结,正是这本书的突出特色和独到之处。

关于纪录片创作,维坚在实践中积淀了多维度的理性思考和判断,这些认识和判断不见得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完整的系统性,有个别观点甚至可以商榷,但是整体看来具有独特而珍贵的价值。首先,本书对纪录片创作的重要方面和关键环节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观点和判断,不乏创新性。全书从题材、采访、结构、叙事等方面设题开论,关涉了纪录片的核心要素,牢牢牵住了纪录片创作的牛鼻子。在分析归纳的过程中,作者没有人云亦云,而是从自己大量丰富的创作实践中萃取和提炼,将实践和理论紧密结合,形成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比如,作者从主客观结合的角度论述政论、文化类纪录片创作,认为“在创作中应充分调动和运用各种客观表达手段,以真实性的叠加不断逼近事实核心”,并提出了增加这一类纪录片客观真实性的方法路径。比如,作者将纪录片的“结构”看作创作中的动态取舍和架构过程,这显然有别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纪录片“结构”。它不是简单的概念和视角转变,它使我们的观察和思考前移,深入到创作的内部和进程中去,对结构在作品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特点作出分析判断,得出一种全新的认知和思考:“纪录片的结构,就是要架构人物和故事情节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之互相对抗、碰撞、影响,产生情节发展驱动力,不断将故事引向深入。”这种新的认知和思考,

无疑将使创作者摆脱路径依赖,形成新的创作理念。再比如,在论及纪录片的叙事技巧时,作者用“拎着走”与“拖着走”来比较两种叙述方式,形象生动地论述了纪录片的叙事策略。其次,本书源于实践,归于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全书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和宏阔的论证,没有大而化之泛泛而谈,字里行间都是具体而实、具体而微的创作操作,全都结合作者本人的创作实践展开论述,形象生动,贴切可感。比如,作者在论及采访之道时,从“备、平、磨、时、亲、境、挖、追、疑”九个细小环节入手,将一个成功采访的关键要素全部揭示出来,可操作性极强,拿来就可以用,用了就会见效。再如,作者谈到的“境”,也即采访中的“情景代入法”,就有非常大的实用价值,如果年轻记者体察并学会了“情景代入”的谈话技巧,将有助于提升其调动被采访对象感情因素的能力。尤为可喜的是,全书在每个维度论述之后都选登了作者的获奖作品,创作论述所依据的例证大多来自他自己的作品创作,读者既可结合作品琢磨创作,亦可研读创作论述后体味作品,事理互鉴,相得益彰。总之,这是一本值得电视人研读琢磨、交流借鉴的好书。

纪录片是一门实践的艺术,其创作方法和路径见仁见智,没有一定之规。我觉得本书的价值在于多开了一扇窗户,多辟了一条路径,使年轻的纪录片人在创作中打开思路,受到启发,有所借鉴。当然,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捷径,所以我很欣赏本书最后一章“坚韧是金”,似乎无关纪录片创作的“学理”问题,但是它恰恰揭示了纪录片创作的核心所在,希望年轻的纪录片人也能从这一章中受到教益。

纪录片是现实之镜,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现实为纪录片人提供了最广阔肥沃的创作土壤。这是一个创作的最佳时代,不媚俗、不苟且、独立思考的纪录片人应当担当责任,以深刻的历史反思、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浓厚的文化底蕴与理想共舞,记录下这个时代最真实、最震撼的画卷。

期待维坚在纪录片创作、研究和电视工作上不断有新收获!

中国视协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

文 弘

2015年9月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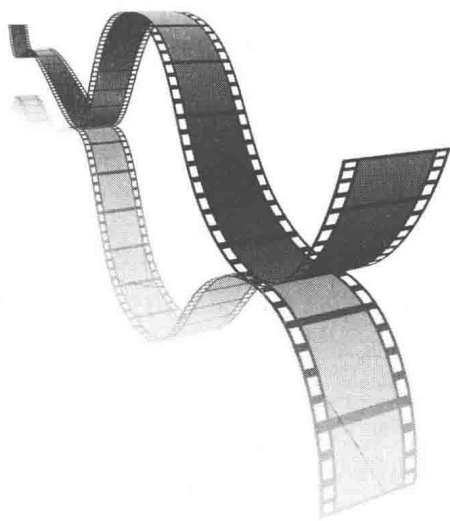
目 录

维度一 题材为王	(1)
以光影之轻载时代之重	(3)
一、大背景下的故事与人物	(3)
二、搜集材料与实地调研	(4)
三、关切和呼应社会现实	(7)
四、抓取独特的“这一个”	(9)
五、播撒人文主义情怀	(11)
作品：乡胞祭	(15)
评论：开掘之中见功夫	
——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袁正明谈《乡胞祭》	(22)
回忆：一段特殊的忘年交情	任世淦(23)
维度二 采访有道	(25)
让沟通之门豁然开启	(27)
一、备	(27)
二、平	(29)
三、磨	(31)
四、时	(32)
五、亲	(35)
六、境	(37)
七、挖	(40)
八、追	(42)
九、疑	(43)
作品：武文斌	(46)

维度三 结构驱动	(53)
荡结构之桨向真相深处漫溯	(55)
一、结构与“摆弄”	(55)
二、结构勾勒坐标系	(57)
三、结构与主题	(59)
四、结构驱动情节	(62)
五、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	(64)
作品:我的学籍哪里去了	(68)
维度四 叙事给力	(77)
曲径通幽处 尺水兴波澜	(79)
一、悬念	(79)
二、“钩子”和兴奋点	(81)
三、矛盾冲突	(84)
四、“拎着走”与“拖着走”	(87)
五、渲染和放大	(88)
六、细节	(90)
七、现场和纪实	(94)
作品:牵手	(97)
维度五 刀锋起舞	(111)
特定主题纪录片的创作空间	(113)
一、思想厚度和锐度	(114)
二、宏大和细微之间	(116)
三、主观意图客观表达	(119)
作品一:永恒	
——沂蒙精神与群众路线	(127)
作品二:沂蒙精神颂	(140)
维度六 音韵之美	(151)
从耳膜到心灵的神奇共振	(153)
一、声画融合之美	(154)
二、巧妙运用之美	(157)

作品一:共圆精彩	
——“十一运会”开闭幕式创作揭秘	(164)
作品二:极限人生	
——记一级残疾军人朱彦夫	(179)
维度七 坚韧是金	(189)
一次灵魂和意志的修行	(191)
一、震区散记	(191)
二、虎年春节北川行	(195)
三、融入援川铁流	(200)
四、穿越播禹路	(207)
五、另类“亲密接触”	(211)
六、无法抹掉的记忆	(213)
作品:重建北川	(220)
后 记	(272)

维度一 题材为王



以光影之轻载时代之重

纪录片是光影的艺术，声像转换之间就完成了—个故事的叙述。光影很轻很淡，故事讲完了光影就随之散去了；光影很深很重，深重到可以浓缩一个时代，钩沉一节历史，熔铸一种精神。

轻或重，短暂还是永恒，这是衡量纪录作品价值的重要尺度；以光影之轻载时代之重，乃是纪录片人穷其梦想和生命追逐的至高境界。当纪录片人满怀创作激情审视这个世界的时候，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拍什么？

一、大背景下的故事与人物

选什么样的题材，讲什么样的故事，永远是纪录片创作首先要解决的课题。所谓“选到好的题材作品就成功了一半”，说的正是选题的重要性。纪录片所涉题材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人文社会和—然科技两大类，本文所探讨的问题均针对人文社会类纪录片。题材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题材指纪录片所记录的客观世界的某个领域，如工业题材、农村题材等；狭义的题材指在素材基础上提炼出来的，编辑进作品的事件和现象。大千世界林林总总，社会生活千姿百态，皆可成为纪录片人关注拍摄的题材。但是如果做出有分量的作品，并能在评奖中摘金挂银，就不能不进行审慎的选择。纪录片的本质属性是“非虚构性”，也就是真实，它是时代的档案和社会之镜，只有那些反映、洞见社会本质和发展方向的作品才最具备优秀纪录片的品质。古人云：“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有影响力的纪录片作品从来不可能是象牙塔里的自吟自唱、孤芳自赏，它必须将拍摄镜头探入时代洪流之中，关注国家民族利害所系、国计民生主要矛盾、阶层群体利益诉求、思潮舆情流向变动，揭示时代本质，洋溢时代精神，为历史刻录下最具真实性、最有价值的影像纪实。

概言之，纪录片作品的题材应当叩击时代脉搏，呼应社会关切，善于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定格人物，铺陈故事。

创作于2005年的纪录片《乡胞祭》时长仅20分钟，但就是这件并非“鸿篇巨制”的作品，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数次折桂，一连摘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四川国际电视节纪录片“金熊猫奖”、金鹰电视节纪录片“金鹰奖”三大奖项。当穿行在城市之间，在颁奖台上一次又一次将奖杯高举过头，笔者内心深处一直在敲打着一个问号：为什么这件作品能引起如此隆重而持续的关注？想来想去，笔者认为这与纪录片题材的选取有着莫大的关系。

也许人们很难想到，《乡胞祭》的创作缘起竟是报纸的一篇小“豆腐块”。2005年，某报刊登了退休教师任世淦搜寻日军罪证的消息，原文虽仅有寥寥数语，风轻云淡，但我们读到时却怦然心动，一下子掂出其待发掘的千钧力量——在新世纪中日关系趋冷的大背景下，历史问题已成为横亘在两国之间的巨大障碍。国际上，日本右翼一再否认侵华史实，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大有死灰复燃之势；而在国内，看似高涨的非理性仇日情绪下掩盖着严峻的现实——很多地区日军侵华罪证或空缺或湮灭，普通民众对屈辱历史或冷漠或遗忘。对我们国家和民族而言，比起骂几声“鬼子”、嚷几句仇日口号更为迫切的是，将“铭记历史”付诸切实具体的行动。

退休教师任世淦正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先行者。

二、搜集材料与实地调研

充分的调查研究是遴选和确定题材的前提。在很多情况下，直觉会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好题材，但是在下决心拍摄这个题材之前，必须认真做很多功课。首先，围绕这个题材寻找尽可能翔实材料，包括直接相关材料、间接相关材料、类似材料、延伸材料等，尤其要重视大背景材料，即故事发生和人物活动的社会环境和关涉因素。另外，一定要搜集到正反两方面材料，防止一边倒、片面化，初步建立起对这个题材全面、立体、辩证的认识。其次，深入实地调查研究。通过现场查看，与当事人、见证人、相关人、相关部门交流沟通，可以辨别真伪，掌握实情，核对、修正此前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实地调研分析能够使创作者进一步发掘认识的深度，更好地把握题材。再次，根据所掌握材料和实地调研情况，结合时代背景和社会趋势进行综合分析评估，从全局高度科学判断题材价值，最终作出拍摄与否的决定。

2005年4月，我们前往枣庄拜访任世淦老师。任世淦，1936年出生，是

土生土长的枣庄人，而枣庄则是一个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地区。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30日，平津失陷；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并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日军占领南京后，为了连接南北战场，打通津浦线，把徐州作为攻取的首要目标，枣庄的台儿庄恰是徐州的门户，在这里发生了闻名中外的台儿庄大战。在整个日军侵华期间，枣庄都是日军盘踞的重点，这里的群众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斗争，著名的铁道游击队就活跃在枣庄一带。凡是抗日斗争激烈的地方，日军对普通老百姓的屠杀镇压都是丧心病狂的。八年抗战，枣庄有大批无辜群众被日军残害，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日本兵留下的罪孽血债。任世淦正是出生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战乱、奴役、屠杀、逃亡等等如影随形，伴随他度过童年。他的一个表妹就是被日军枪击致残的，众多家乡同胞被蹂躏、被屠戮的惨剧刻印在他的记忆中。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任世淦对那段历史怀着痛切肌肤的情感体验，也奠定了他做出搜集日军罪证这一举动的感情基础。

任世淦搜集日军罪证虽是一种自发行为，但将其动因完全归结为个人情感需要未免略显单薄。我们在调研过程中，有意识地探寻任世淦个人行为 and 现实社会诉求之间的契合点，萃取其普遍的时代价值，这是作品题材甄别和前期构思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为使选题调查探入深层，我们在鲁南地区农村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走访。我们惊讶地发现，在鲁南这个日军曾犯下累累罪行的地区，60年后的今天，关于那场民族灾难的记忆竟已模糊不清，有些甚至消弭殆尽。



2005年7月，作者（左）采访任世淦



摄制组深入鲁南山区（从左至右：孙国栋、作者、任世淦、庞昌宪、侯晓文）

首先，很多记录日军罪行的档案资料过于简单、笼统、概括，甚至缺失不全。用任世淦的话说就是：“我翻开一些地方的资料，我们同胞受（日军）杀害的事实非常少，具体到这一个村，到底杀害多少人，能够具体落实到某家、某户、某人吗？”由于长期以来对史料工作的漠视，加上有关部门缺乏科学求实精神，我们的史料往往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有名有姓具体到死难者个体的记载比较少。随着越来越多幸存者和见证者离开人世，这种缺失将逐渐固化为永久的历史空白。

这并非个案，在任世淦生活的鲁南地区不乏其例，在其他地区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近年来，在与日本极右势力展开的捍卫历史真实的交锋中，不具名单的屠杀事件往往成为证据软肋，日本右翼分子借题发挥，颠倒黑白，翻案历史，我们有时却因拿不出“铁证”而束手无策。

其次，不仅史料记载语焉不详，而且我们在进村入户调查采访中还发现，很多村民尤其是青壮年人，对自己村庄60年前发生的灾难知之甚少，有的甚至全然不知。比如，曾经被屠杀血洗的村庄，村民后代竟然不知道村里来过日本兵，外孙竟然不知道自己的姥爷是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如果不是耳闻目睹，我们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而这种遗忘历史的情况在国内其他地区也屡见不鲜。

同为二战屠杀受害者，犹太人对民族灾难的态度和记忆让人肃然起敬。

他们战后就开始搜集、整理死难者史料，“直到最后一个犹太人，直到最后一个名字”，以色列前总理沙龙说，“我们有责任去记住和缅怀每一个人（死难者），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照片，他们的故事，让他们的形象深入到我们、我们的孩子以及子子孙孙心中”。二战期间近600万犹太人被纳粹屠杀，目前，在耶路撒冷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里，300万犹太死难者的名字和部分人的照片被整齐地镌刻在纪念墙上；通过“犹太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全世界都可以在互联网查询到300万遇难者的姓名、出生地、职业、配偶、遇难地点，甚至遇难者“名字背后的故事”。反观我们，“南京大屠杀”30万国人罹难，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哭墙”却只能列出其中10311个名字，这怎能不让我们这些后人羞愧、自责并深深地反思呢？

在我们遗忘的同时，日本右翼势力气焰嚣张，他们公然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驳回中国遇难者的诉讼请求，妄图全盘否定历史真相——这就是罪恶制造者对待历史的态度。

如果把任世淦调查日军罪证的行为置于上述现实大环境之中，就会发现任世淦这位普通中国公民身上，浓缩着强烈的现实紧迫感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他用调查和记录日军罪行的实际行动，与淡忘和篡改历史的行为做不懈的抗争，唤醒国人对历史的清醒记忆；他的所作所为，牵动一个民族的历史情感和现实诉求，体现了正确的历史观和可贵的爱国精神。“小人物”承载了“大精神”，这正是任世淦所作所为震撼人心的力量所在。

还需强调的是，纪录片的选题一定要“生逢其时”，这个“时”指时代，当然也包括具体的时间。在特殊的年份选择有特殊意义的题材制作播出，无疑会增加作品的价值力量。从《乡胞祭》题材选择的时机也即时间背景看，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届时国内外必然会形成缅怀纪念和检讨反思的高潮，适时推出一部切中时弊、振聋发聩的纪录片无疑会取得最佳传播效果。

三、关切和呼应社会现实

《乡胞祭》的选题印证了这样一个道理——纪录片的价值和力量永远来自对现实的关切和呼应。本书收录的其他作品也都如此：《武文斌》将镜头对准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的解放军官兵，为“80后”“90后”新一代子弟兵刻画出血肉丰满的雕像；《重建北川》关注震区灾后重建，记录了3万山东援川大军与当地人民戮力同心再造一个新北川的雄浑史诗；《我的学籍哪里去了》直

击教育腐败，为教育发展实现公开、公平、公正发出沉痛呐喊；《共圆精彩》揭秘十一届全国运动会开闭幕式的台前幕后；《永恒——沂蒙精神与群众路线》紧密结合党的群众路线主题教育活动，从现实迫切需要出发，到沂蒙老区苦难辉煌的革命史中汲取营养，探寻筑牢党群关系根基的永恒真谛；《极限人生》的主人公朱彦夫，是中宣部推出的首位“时代楷模”人物，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他挑战生命极限、无私无畏、带领群众致富的故事震撼了千万人；《牵手》聚焦残障人士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讲述他们战胜自我、互相支撑、成长成功的故事，表达了人类因和谐而完美的深刻主题。

长期以来，国内纪录片界在选题上一直存在边缘化、琐碎化的倾向。老少边穷地区，风土人情状况，“最后的××”系列，“小人物的命运”，以及大量的历史文化题材，成为纪录片创作的主战场。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时，有关机构准备举办一场反映30年历史进程和社会嬗变的纪录片展播，却苦于找不出几部承载这些内容的片子，最终放弃了。造成边缘题材受创作者青睐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少纪录片创作者认为边缘题材更符合国际潮流，“更像纪录片”，能得到外国同行的认可，其实情况恰恰相反。笔者参加过多次中外纪录片交流会议，国际购片商采购中国纪录片，首选条件就是要反映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国外观众通过纪录片最想了解中国老百姓的现实生活 and 所思所想。



任世淦（左二）访问在济南行医65年的日本老兵山崎宏（左三）

当然，这里丝毫没有贬低边缘题材的恶意，并且笔者也很赞赏边缘题材纪录片优秀作品的水平与价值。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纪录片人应当